

讚辭

榮譽教育學博士

鍾期榮博士、胡鴻烈博士伉儷

校董會主席先生：

我今天深感榮幸，能在這裏誦讀鍾期榮博士及胡鴻烈博士伉儷的讚辭，以表揚他倆為香港的教育及社會發展奮鬥終生的努力。兩位前輩教育家生於國難深重的年代，於艱苦中完成大學教育，其後更一同留學法國，是當時極少數的社會精英，本具足夠條件享受上流社會優裕而安逸的生活。然而，二人卻甘願放棄物質財富，耗盡積蓄，在港創辦前身為樹仁學院的樹仁大學，在不獲政府資助下艱辛經營三十六載，為香港私立大學的發展寫下光輝的一頁。現在，就讓我們回顧二人一生對本港，尤以教育的貢獻。

鍾、胡二人同生於一九二零年，分別祖籍湖南長沙及浙江紹興，少年時代已才華出眾，鍾博士為中國早年著名女法官，胡博士則為外交官員。隨著當時國內局勢逆轉，二人遂於婚後遠赴法國進修，同獲法學博士學位。胡博士其後再赴英國考取大律師資格，夫婦二人於一九五五年定居香港。

來港後，鍾博士即投身大專教育，曾於聯合、崇基、珠海及浸會等院校任教至六十年代後期，並曾擔任浸會學院社會學及社會工作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鍾博士在浸會學院任教社會工作學系期間，更培訓了本地首批社會福利工作人員。

胡博士來港後即於法律界執業，當時從事收入較高的事務律師必須持有英國國籍，但他為了保留中國國籍而情願當薪酬較低的訴訟律師。在本港民生困頓的年代，置身上層社會的胡博士卻走進基層，為窮人免費打官司，彰顯公義。胡博士於六、七十年代出任立法局議員及市政局民選議員，其後任市政局副主席，成為當時少數的參政華人，期間積極爭取建立公義的制度，如成功爭取把中文列為官方語言。

一九七零年代初，夫婦二人同屆知命之年，以其優裕條件，本可於五十歲便計劃退休。然而，眼見目下青年人的教育機會匱乏，能接受高等教育者只為適齡學生的百分之一點五，遂於一九七一年創辦樹仁學院，為青年人提供接受大專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敦仁博物」的精神，讓在殖民地成長的青年人，得以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培養樹德立仁的精神和品格，成為社會的明日棟樑。

眾所周知，樹仁的發展道路顛簸不平，但為了堅持教育理想一直不接受政府的資助。胡氏伉儷耗盡積蓄，先後自資購入跑馬地及灣仔區的物業作校舍之用。二人數十年來為學院籌募經費奔波，雖於一九七八及八八年曾兩度有機會接受政府資助，但為了保證學生的學習質素，並深信四年制的大學乃世界主流，因而堅拒跟隨政府的三年大專學制，致未能獲得政府資助。惟二人繼續以「歲寒松柏、風雨雞鳴」的堅毅精神，經營樹仁至今。

精誠澆灌終見收成，樹仁在過去三十六年來不斷壯大，於創校五年後的一九七六年，成為港府承認的私立大專。三十年後的二零零六年，更通過了多重的學術資歷評審，獲政府升格為「香港樹仁大學」，成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為本地的高等教育發展添上重要意義。而於新世紀推行的本地教育改革，政府把一向實施的大學三年制改為四年制，印證了鍾、胡二人當年擇善固執的正確決定。

如今，樹仁已培育數以萬計的本地青年，當中不少成為各界精英，於政商、教育、新聞傳播、文化藝術及社福宗教等領域作出貢獻。現時的樹仁大學設有三個學院和十三個學系，並與國內及海外大學合辦課程，成為具國際地位的專上學府。

在香港向來功利掛帥的社會氛圍下，兩位前輩當年創辦的樹仁，為眾多被拒於大專教育門外的合資格和適齡青年，提供一個機會，讓其潛能得以培育和發揮，讓其人格得以建立和臻善，讓其成為社會不斷進步的原動力。

鍾博士和胡博士從早年以精英身份服務香港大眾，至後半生全情投入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少畢業生仍難忘兩人事事親力親為，在校勉勵學生奮發學習的情景。至今以八十七歲的高齡，胡氏伉儷仍勤於校政，所顯現的正是中國知識分子以社會為己任的氣節，以及西方人文精神的實踐。兩位教育家畢生為香港社會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堪足景仰。

主席先生，本人謹請閣下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予鍾期榮博士及胡鴻烈博士伉儷。

讚辭

榮譽教育學博士 馬飛龍教授

校董會主席先生：

本人十分榮幸能在此介紹馬飛龍教授。馬飛龍教授是位卓越不凡和受人景仰的學者，不單在全球教育研究方面貢獻良多，其研究工作更對整個香港教育界影響深遠。馬飛龍教授的成就不勝枚舉，片言隻語的簡介，實難以涵蓋其豐碩建樹。惟本人仍會就教授的芸芸建樹中選出最突出的幾項，以誌其人其事。

馬飛龍教授於一九三九年生於匈牙利，十七歲時移居瑞典。旋於兩年間，不獨尋獲自己的理想國，更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自始，馬飛龍教授即心繫其夫人冰潔女士，當然還有他熱愛的工作。

馬飛龍教授於瑞典哥德堡大學修業，一九六四年獲文學士，一九六七年獲哲學博士，一九七零年獲科學博士學位。一九七七年至二零零六年間，他是哥德堡大學教育及教育研究系的教育學教授，自二零零六年退休後一直擔任該校的榮譽教授。

馬飛龍教授成就卓越，尤以關懷學生、教導有方及扶掖後進最為人稱道。經他督導而取得研究成果的哲學博士生便超過五十人；其中十位後來更成為主任教授。馬飛龍教授曾與多個不同國家的同工進行各種合作性研究計劃，他本人更是逾二百份研究報告的作者。

馬飛龍教授屢獲殊榮，其中兩項至為矚目。二零零六年，他榮獲「瑞典教師工會獎」，肯定了他在結合教育理論與實踐方面的貢獻。本年八月三十一日，馬飛龍教授再以其「在學習與指導科學方面的卓越貢獻」，獲學習與指導研究歐洲聯會頒贈「二零零七年度傑出成就獎」。此外，他亦曾先後於二零零零年獲英國愛丁堡大學，及二零零三年獲芬蘭赫爾辛基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一個令馬飛龍教授終生思考的問題是：「別人是怎樣看事物的？」通過研究，馬飛龍教授有所發現——對事物的看法雖或因人而異，但一般人總以為別人的看法會跟自己的相同。從研究過程中，他發現縱使人們對某些現象有著不同的觀點或解讀，但某些看法應較其他的更為高明。這些研究結果驅使馬飛龍教授不斷探求學習本身的特質，還開展了他終身鑽研「變易理論」的學術生涯。至一九七零年，他已經完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構想——「學習的結構性互動」。五年後，他聯同其研究小組，在哥德堡建立了一門名為「現象圖式學」的研究專科。自始以後，該理論啟迪了不下一百五十篇博士研究論文及一千五百份學術研究報告。馬飛龍教授曾是五份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的編委，在超過二十個國際會議上擔任主講嘉賓，也曾應二十多個國家的大學邀請前赴講學，次數多不勝數。

馬飛龍教授在教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探索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他孜孜不倦地思索為何某些看似能力不逮的學生，總是會有些老師能更有效地帶領他們學習？然而，他結果是三十年後才有機緣再重拾這個問題的研究。事緣於一九九七年，馬飛龍教授應香港大學邀請，擔任「傑出訪問學人」；在港期間，他帶領研究小組，在香港和瑞典兩地同時展開工作，研究同一教材由不同教師處理會帶來甚麼分別。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課堂的學生學習成果有顯著分別，而這些分別又是與教師如何處理他們授課的內容息息相關。

近年，馬飛龍教授致力倡導「課堂學習研究」，藉此測試他的「變易理論」。「課堂學習研究」是由不同組別的教師和教研人員合作進行，讓教師利用學習理論的觀點結合特定的課題，來策劃學生在課堂上的經驗，研究的成果昭著。「課堂學習研究」現已在不少國家推行，但居於領導地位的，卻是本校——香港教育學院的「院校協作與課堂學習研究中心」。馬飛龍教授的努力，為香港的「課堂學習研究」奠定了基礎，而此項研究對學界影響深遠；超過二百七十所學校、數以千計的師生，均能從課堂學習研究活動中獲益。香港教育學院是去年「第二屆課堂學習研究國際會議」的東道主，會議期間「世界課堂學習研究學會」宣告成立，藉以聯繫世界各國從事「課堂學習研究」的學者。時至今日，馬飛龍教授仍然出任香港教育學院的顧問教授，對本校的貢獻可謂彌足珍貴。

主席先生，本人謹以上述讚辭引介馬飛龍教授，並請閣下授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讚辭

榮譽教育學博士 許嘉璐教授

校董會主席先生：

我懷著欣喜的心情在這裏誦讀有關許嘉璐教授的讚辭。許教授為中國當代著名的語言學家，長期從事中國語言學、文字學、古代文化學、訓詁學，以至中文信息處理等學科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作甚豐，在漢語語言的學術發展和教育方面貢獻良多，一九八六年更獲中國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殊榮。

語言不單是人際溝通的工具，也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思想和人文精神的載體。許教授既專研語言學，同時亦對文化發展的省思及其未來建設等課題興趣甚濃。他尤其熱切探尋如何傳承中國文化的精粹，讓古老的智慧為解決當世難題帶來啟示，協助當代人應付現代化及全球化的挑戰。

以下簡述許教授在文化、教育等領域所作的貢獻。許教授於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隨即返回母校任教及服務。於一九五九至八七年間，許教授歷任北京師範大學的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教研室副主任、教研室主任及中文系主任等多個職位。於八七至九四年，更出任該校副校長及教授，現時則為該校的漢語文化學院院長。

許教授擔任國內多個與語言學研究有關的公職，將其學術造詣轉化為實質有利社會發展的資源。他於一九八七至九四年間，分別出任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及會長、國家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及北京語言學會副會長，一九九四至九七年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許教授亦為國內政務機構要員，他自一九九八年至今，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許教授著力關注國內的教育問題，曾全程參與制訂於去年實施的新修訂《義務教育法》，爭取落實讓國內所有適齡學童均獲得教育機會的政策；法例實施後，許教授更親自率領有關人員，到偏遠地區查察法例的執行情況。許教授並關心環保問題，不時到國內不同地區視察生態及環境狀況，推廣環境保育工作。

許教授非常關注文化問題。過去幾年，他經常在國內不同場合，包括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會議上，都提到當前的文化問題，亦經常到基層地區作普及性文化演講，及發表重要文章。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發展中，經歷急風暴雨般的劇變和艱鉅挑戰，原有傳統文化衰落凋零。許教授力挽狂瀾於既倒，熱切關注保存並承傳中國文化體系內可取的元素，挽回該等久經錘鍊而能道濟古今的傳統智慧和人文價值，以助解決當代社會的難題；其中許教授尤其倡導中國文化中的和合哲學，追求人與人、人與自然、現實與未來的和諧。在現代化和全球化急劇發展下，許教授倡議不同文化的對話及融合，建構多元世界。許教授在國內關注和推動自身的文化體制改革，對外則致力研究及推動漢語國際化，協助外國人認識中國語言及文化。在他的領導下，一本專供外國人學習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漢語世界》雜誌誕生，成為文化溝通的橋樑。

許教授對香港的教育貢獻巨大，過去曾在香港樹仁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等科目，對本校的普通話培訓發展更予以不少助力。一九九五年，香港教育學院開始為香港的普通話教師提供短期駐京普通話沉浸課程，參與的教院學生及在職學員成為首批到內地作同類學習的香港人；而接待本校師生的教學單位，正是由當時許教授領導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一九九四至九七年間，本校與委員會聯繫，商討在本校成立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在許教授的支持下，雙方終在九七年簽署合作協議。當時出任委員會主任的許教授更是簽約人。至今，香港所有主要高等院校已分別成立了普通話測試中心，令本地的普通話教師培訓及有關教學工作得以穩步發展，許教授給予我們的扶助與支援實在功不可沒。

從事語言學教育近半世紀的許教授是資深的教師，對教育和教師角色有發人深省的詮釋。在追求經濟發展及物質文明高於一切的現代化發展中，許教授認為現代學生接受教育，人格的培養高於知識的傳授，因為人格才真正決定學生的一生。他認為教師任重道遠，應以「苦其心智，宏道化人」的精神，承擔起塑造學生人格的重任，給學生以生命價值的關懷。本校職志培育人師，宗旨既是「培養文行兼修、敬業愛生的教育工作者」，與許教授的教育觀同軌一轍，亦自當以其教育信念恆常自勉儆省。

主席先生，本人謹為閣下引見許教授，並請頒授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予這位卓越的學者。